

学林

◀ (上接5版)

心在华,鼓励、支持或影响了这个项目?此外,钢和泰在总体上对翻译佛经的热衷,学术界早有论述。但针对具体项目,是否有人逐一作过考察?

我感觉,卫礼贤在中国与钢和泰多次长谈,回德国后不至于完全忘了译经之诺。而对为什么父亲会记得“卫礼贤”,我想到几种可能:

一是钢和泰对沈仲章介绍这个项目时,说由卫礼贤主持,或说他与卫礼贤合作。如此,父亲便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,因而自始至

需要探索的是,卫礼贤起的是什么性质的作用?是否可算项目主持人或倡导人?还是,卫礼贤或钢和泰仅仅告诉鲁雅文,他们在1922年的一些想法?

我又仔细回想父亲措辞,辨析语境,还是有层次差别的。父亲若描述具体工作,被助之人是“德国教授”或“德国学者”。若说明为谁工作,则是“德国教授”、“德国学者”、“Wilhelm”或“钢和泰(他们)”。这里我试用“助”和“为”区别关系,其实父亲口语中大都用“帮”。“帮”有很大弹性,可近距可远程,可实指可虚

(源自一国际佛教协会网络版,允许转引)。每则之后加按语,就本文主题,稍议浅见及可思之点,一般不考证人名地名等等:

【1928年11月】

十四日,郑松堂以德国佛朗府大学中国学院卫礼贤院长之函来近(环游记)。

[沈按:“佛朗府”即法兰克福。1928年11月14日,太虚仍在比利时,卫礼贤已派人持函致意,可显郑重与主动。]

十七日,晤卫礼贤。商定:郑君为大师译华成德,编书交敏兴之雪洛斯书店。中国学院学员詹显哲,常来为大师译语

语。实为卫君代讲之误。

[沈按:摘文“按”当为印顺按。“卫君代讲”四字值得注意,表明卫礼贤对佛学知识有自信,太虚也能信托卫氏代己演讲。也可参照上则“此稿”是否德文之疑,综合思考。]

五日,大师返佛朗府。寓中国学院,常占一室以诵经(环游记)。

[沈按:太虚“寓”卫礼贤主持的“中国学院”,可为两人会商谈提供方便。]

十二日,大师着衣诵经次,卜尔熙公使来,卜使约大师及卫礼贤,作莱茵河探胜之游。与卜使谈及:国际间相忌相侵,终无以得人世之和乐(环游记;与德人谈话鳞爪)。

[沈按:虽仅录外事交际,然卫礼贤应约作陪,也涉佛缘。]

十四日,大师讲演“佛学之变迁大势及其新倾向”于中国学院,卫院长译语。听者二、三百人,皆热心东方文化及哲学与佛学研究者(环游记;海十、一《佛学要闻》)。

[沈按:至此,卫礼贤为太虚演说“译语”或“代讲”,记录已达三次。]

其间,大师与卫礼贤商决:以中国学院为世院之德国通讯处,招集发起人。于院刊译载中文佛经(环游记)。

[沈按:“世院”为世界佛学院之简称;“院刊”指中国学院院刊还是世院院刊,待考。试解“其间”二字:自太虚11月中旬抵达法兰克福,至少自12月5日“寓中国学院”起,便与卫礼贤商量相关事宜,至12月14日决定。此处简单回顾上文卫礼贤1922年日记信息,供参考:卫礼贤与钢和泰为译经之事,长谈多次,某次达三小时半。]

【1929年1月;太虚于1928年12月20日抵柏林】

四日,远东协会总秘书林待,以卫礼贤之介,约大师往晤;见会长叩尔纳等(环游记)。

[沈按:协助扩展社交一例,方便太虚弘扬佛道。]

二十七日,司泰恩凯来访。司氏于禅定颇多熏习。卫礼贤来访,知征求世院发起人,已得各国六十余人之赞允;大师乃与话别(环游记;与德人谈话鳞爪)。

[沈按:1929年1月28日太虚离德。27日卫礼贤来柏林,专程“话别”,并报喜讯。而佛学院若遍及“各国”,译经自然水到渠成。]

我特别关注1928年12月14日下段,卫礼贤答应太虚,“译载中文佛经”。依印顺括号

注,所录源于太虚《环游记》。据查,《环游记》1930年即由大东书局出版,信息应相当可靠。

1937年,太虚著《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》一文,进一步回忆:“与德国福朗福特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卫礼贤,有大规模译华文佛典为德英文之约,惜因筹款无着及卫礼贤之病逝,未能有成。”(引自张曼涛主编《中国佛教史论集》,大乘文化出版社,1978)

对卫礼贤和太虚计划“大规模翻译佛经”,洪金莲《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》(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,1995)也有提及:“民国十八年,太虚在德国与卫礼贤共同约定翻译华文佛典为德文、英文,但后来因经费拮据及卫礼贤逝世而告中止。”

《中华读书报》2017年9月20日载李雪涛《太虚法师1928—1929年的德国之行》(简称李文),介绍时任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的太虚出访德国,“一共待了74天”。李文设专节讲述太虚与卫礼贤的接触,引用不少文献,也言及译经计划,还有一张卫礼贤和太虚法师及 Botschafter von Borch(卜尔熙)的珍贵合影。

以上记载显示,在太虚访德期间卫礼贤涉佛之多方面:会见佛教大师,陪同游览,招待住宿,邀请演讲并翻译,甚至“代讲”,征求世界佛学院发起人,充当通讯处,商量决定译经,承诺出版……可见,卫礼贤1922年起念翻译佛经,到1928—1929年兴趣不减,而且对理解佛学的自信已达相当程度。

我好奇的是,卫礼贤和太虚在德国商决“有计划地翻译佛经”之约,与钢和泰、鲁雅文和沈仲章在北平的译经项目,有无任何关联?所言“筹款无着”,可否解释鲁雅文为何自筹资金?卫礼贤既肯积极“征求世院发起人”,是否也会主动征求佛经译者?而鲁雅文在北平之尝试,有否树立榜样之意图?记忆力很强的沈仲章,为什么偏偏“记住”,钢和泰推荐他协助的是卫礼贤?

证是或证否,都待确实依据,暂且归于因缘。

至此先作小结:为求证父亲回忆,我关注卫礼贤涉佛踪迹。通过原始日记,窥见1922年卫氏佛缘初现;通过佛界文献,又见1928—1929年卫氏佛缘重显。

下一个焦点在于,卫礼贤两度许愿译经,是相隔六七年的两组孤例,还是连续历程之

(下转7版) ▶



僧袍,鲁雅道提供

终认为,他是协助钢和泰和卫礼贤。

二是鲁雅文自己开口常言卫礼贤。这第二种可能,源自吴素乐“解谜”时所猜:“Rousselle idolized RW and will have talked about him a lot to your father in whose mind the two then were blended into one.”(大意为:“鲁雅文把卫礼贤当偶像,会老对你父亲说起他,因此在你父亲的脑子里这两人合二为一。”)

从吴素乐所言,也可引申出第三种可能,即鲁雅文自己对沈仲章说,译经是卫礼贤的项目。于是父亲便会觉得,他俩都是在替卫礼贤工作,并记住了 Wilhelm 这个鲁雅文本人强调的名字。这也可从另一角度,支持我上述假定,即作为卫礼贤继任的鲁雅文,尽力继承其“偶像”前任的未竟计划。

还有第四种可能,卫礼贤确实远距离参与该项目,哪怕限于道义上的支持、名义上的“主持”,或者更具实质意义。

上述几种可能并不互相排斥,可互相支持。或者说,钢和泰、鲁雅文和沈仲章,都在某种程度上,认为卫礼贤对这一项目起了作用。

化。“帮”用作动词,与“助”近义;偏于助动类介词的用法,也含“为”的意思。(“助”也具有弹性,但小于“帮”,尤其吴语使用有限制。)吴素乐猜测的“合二为一”,也许并没发生在沈仲章脑中,而是发生在听闻者与笔录者的信息处理过程中。这更使我意识到有机治史很不简单,暂不扯开。

我继续思考,为什么直接当事人沈仲章,似已淡忘鲁雅文的名字,却一直记得钢和泰,而 Wilhelm 也长存脑中?

我盼再有发现,可证实卫礼贤的佛缘,不止于他在1922年与钢和泰的悬谈。

卫礼贤佛缘之持续

(上):文献记载

我尤其关心卫礼贤在1928年左右,是否仍然未忘翻译佛经。我转了个角度,去佛教界方面查询,果然有记录!这是第十站。

释印顺所著《太虚大师年谱》,记录了在1928—1929年,佛界内外广受崇敬的太虚大师(1890—1947)访德之行。根据太虚本人回忆及早年文献,访德时与卫礼贤多有接触。下面选摘相关数则

(环游记)。

[沈按:太虚16日抵达法兰克福,第二天即会见卫礼贤。郑君与詹君“为大师译语”,皆卫礼贤安排他人翻译之例。]

二十九日,大师讲“身命观与人生观”于佛朗府大学,卫礼贤译语;听者六、七百人,多半为该校员生。大师旧识卜尔熙公使,亦专诚来听。是讲稿,以缘起之“和合”、“相续”为身命,而以唯识、中观义说之。德人读此稿,多有来函商讨者(环游记)。

[沈按:不知德人所读“此稿”是哪样文字?与演讲现场的“卫礼贤译语”有何关系?如果“此稿”是德文,而且根据或参照“卫礼贤译语”整理,也许可考虑是否算卫礼贤的译著,希望学界关注。即便卫礼贤安排他人翻译太虚原稿文字,也值得关注。在此顺便记下逾越本文范围之题:如果“此稿”乃太虚汉文原稿,或可想象德国当时汉学盛况?而“商讨者”来函又是何文?以及延伸问题,学界亦可探之,有益研究文化交流史等。]

【1928年12月】

十二月一日,大师偕卫礼贤,詹显哲去敏兴(环游记)。

按:海刊十卷一期《佛教史料》,谓大师于敏兴与中国学院讲“佛学大纲”,卫礼贤译